本版编辑：兰文飞
E-mail：t4@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7



古田会议与红军长征

古田会议分析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强调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解决问题，并提出了纠正错误的具体办法，对红军长征途中取得同党内错误的路线、思想和行为斗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 汪一朝

毛泽东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提出“按古田会议精神搞好部队建设”，并要求人手一本加以熟读。延安整风期间，中央将古田会议决议确定为军队干部的整风学习文件和全军的教材，并指出“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共产党建军与建党的最早和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不难看出，通过红军长征血与火的洗礼，党中央对古田会议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实际上，中央红军取得长征胜利与长征途中红军始终坚持古田会议精神是密切相关的。

古田会议精神指引推动了中央苏区的创建发展，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央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首次入闽，初步勾画创建以赣南、闽西为核心的革命根据地的宏伟蓝图。然而，在此前后，党内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盛行，革命力量难以壮大，毛泽东的正确思想难以有效贯彻。为此，红四军派陈毅赴上海向党中央报告情况。8月，红四军收到由中央政治局周恩来等主导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导信》。12月29日，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在上杭县古田镇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案》，成为建党建军纲领性文献。自此以后，红军队伍得到不断壮大，成长为一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听党指挥、纪律严明、作风顽强、英勇善战、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能武能文的坚强军队。

在古田会议精神指引下，1930年底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宣告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1933年底至1934年初，中央苏区发展达到鼎盛时期，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和瑞金直辖县，先后共辖66个行政县，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为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奠定了坚实基础。人力支援方面，苏区开展“扩红”运动为红军长征提供大量兵源。1934年5月至9月，中央苏区经过两次突击“扩红”，新增兵源达8万余人，仅红一、三、五、八、九五个主力团在突围转移前夕，就分别补充了数千名新战士，及5300余名挑夫。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有力支援，对红军长征前期的战略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

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原则，从思想政治路线上确保了红军长征胜利

古田会议分析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强调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解决问题，并提出了纠正错误的具体办法。这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对红军长征途中取得同党内的错误路线、思想和行为斗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左”倾错误不仅使党在国统区的工作遭受损失，而且影响到各根据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和实践经验受到排挤、指责、打击，党内正确思想没有成为指导思想。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开始在根据地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使红军陷入极其被动局面，最终导致中央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被迫长征。长征途中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方针，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红军的军事失利在湘江战役达到了顶峰。严酷的事实迫使党和红军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进行思考，党和红军深感没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引是不行的。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正确回归。中央红军由此走出困境，转危为安，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纠正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各路红军最终会师陕北地区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党的正确思想的领导，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不可设想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古田会议确立、经受长征实践检验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成为指引革命胜利的指导思想。

古田会议确立的政治建军原则，从军事路线上确保了红军长征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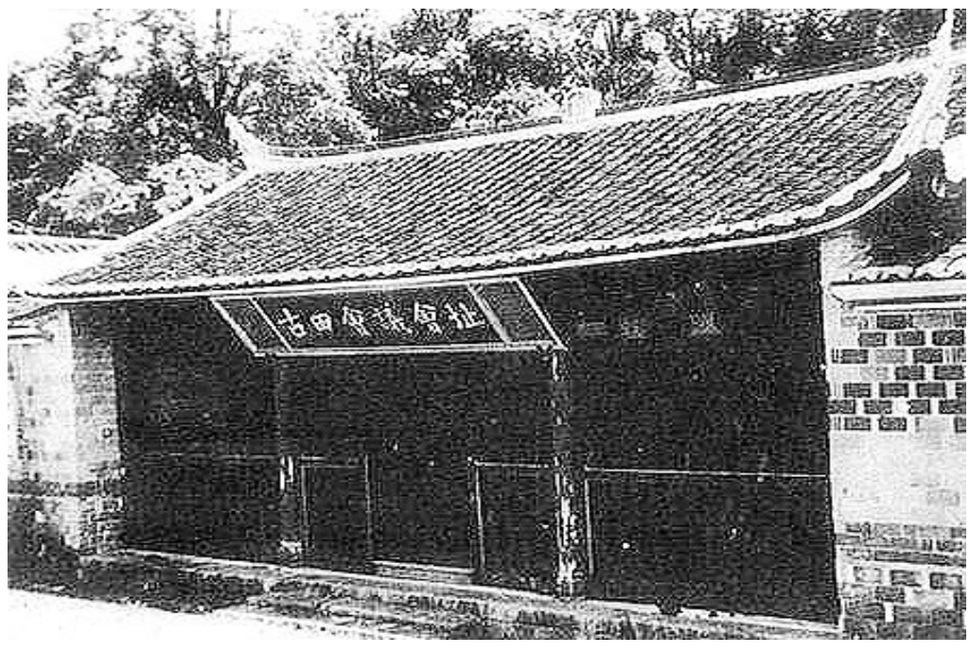
古田会议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除了打仗，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就高度重视军队的政治使命，党中央在《红星报》发表《红军是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宣传者和组织者》，要求红军每到一地要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广泛宣传我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严格遵守纪律，争取群众的同情和支持，树立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红军长征途中，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红军入凉山彝民聚居区后，号召部队百倍努力争取彝民工作，要求每个战士送一件礼物给彝民，绝对不打彝民的土豪，每个连队与驻地彝民举行联欢等，充分体现了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使沿途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军队，从而衷心拥护和支援红军。

古田会议指出，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要防范“党与军事分离”“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并建立正确的上下级关系，增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长征期间，红军各部队及中央军队、组织机构，人员设置经历了数次变更。不论是红一方面还是红二方面军中，都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张国焘不顾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行军以及战争消耗的客观事实，认为红一方面军衣衫褴褛，大量减员，过去号称几十万大军的中央红军，一下子锐减至不足两万人，是党的领导路线错误造成的。张国焘因此（红四方面军约十万人）拥兵自重，企图以枪指挥党，威胁党，发展到另立中央，使党和红军面临分裂危险。党中央从革命事业的大局出发，既坚持原则又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最终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企图，避免了红军的分裂。

古田会议所提出的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内民主思想，从组织路线上确保了红军长征胜利

古田会议从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建设根本原则，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党和军队极端民主化的严重危害，提出要使党内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口号，并形成了一套保护党员民主和基层民主的会议制度。会议所总结的关于党内批评的目的、意义、任务、途径和方法，具有很好的可操作性。这些都为红军长征途中解决党内各种问题提供了示范和指导。

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坚持了正确的组织路线。遵义会议之前，以李德、博古为核心的领导层独断专行，搞宗派主义，导致革命事业重大损失。对此，毛泽东一方面与错误路线坚持斗争，另一方面又利用一切机会团结绝大多数人，和许多同志交换过意见促使他们觉醒。遵义会议以后，党内坚持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解决矛盾，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即便博古犯了严重错误，党中央也没有把他一棍子打死。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与党的宗旨、组织原则和纪律是绝不相容的。然而，党中央仍然以极大的耐心争取他的回心转意，最终促使张国焘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使全党全军团结在新的领导集体周围。二是会风民主。就遵义会议看，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及红军高级将领。会议围绕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和军事报告，开展了认真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上至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周恩来，下至列席会议同志都作充分发言，虽然会上有些同志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并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但会议最终解决了红军行动方向的战略性问题，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三是会议议题明确，思想统一。从通道会议起，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等等，其讨论的议题针对性强，攸关红军的生死存亡和行动方向，也解决了实际问题。四是各方面执行会议精神异常迅速坚决。往往是会议刚结束，会议精神就传达，行动就开始。广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的强大执行力，反映了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内民主建设的巨大威力，成为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保障。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 舒仁庆

红色基因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淬炼的先进本质、思想路线、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总称。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七一”重要讲话中，告诫全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对8800多万名党员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传承好红色基因，始终保持坚强的党性。

传承红色基因是习近平总书记干部教育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用红色基因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强调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用红色基因为领导干部补钙壮骨、立根固本。2011年9月，他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强调，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党的历史，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功绩中获得继往开来的强大动力。2013年2月视察兰州军区时，他指出要发扬红色资源优势，深入进行党史军史教育，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2014年5月视察新疆军区时，他强调要把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2014年12月视察南京军区时，他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2016年2月视察井冈山时，他再次强调要让广大党员干部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多接受红色基因教育。今年“七一”重要讲话中，他进一步告诫全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强调阐释好红色基因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善于结合时代要求，深刻阐释红色基因的时代内涵。如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来阐释“红船精神”；以“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来阐释“井冈山精神”；以“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来阐释“西柏坡精神”等。而且把红色基因的时代内涵不断融入到“好干部”建设之中，从“五条标准”到“四有”要求，再到“四个铁一般”，从“忠诚、担当、干净”到“三严三实”，再到“四讲四有”，贯穿其中的核心内涵就是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强调提高红色基因教育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发挥先进典型作用，多讲革命烈士和英雄人物的崇高风范，多讲焦裕禄、杨善洲、谷文昌等优秀干部的模范事迹，要求把他们的文章、诗文、家书编辑成书用于干部教育，同时强调要充分利用革命基地开展红色基因教育，并与反面典型的警示教育结合起来，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努力达到“不仅震撼一瞬间、激动一阵子，而且能够铭记一辈子、影响一辈子”的效果。

传承红色基因是应对新形势的重要法宝

回首95年来的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有红色基因。现在，我们党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弘扬中国精神、走好中国道路、凝聚中国力量，就要永葆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用好这一重要法宝。

提高党的战斗力需要传承红色基因。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由弱到强、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就是因为始终有强大的精神支柱来坚定信念、鼓舞斗志、凝聚人心。

增强党的免疫力需要传承红色基因。红色基因具备抵抗外来侵蚀的宝贵品质。“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现在我们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在长期执政条件下，“糖弹”的考验，绝不亚于“枪弹”的考验；名与利、得与失的考验，也不亚于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精神懈怠，甚至走上贪腐的不归路，说到底就是信仰缺失、精神迷失、免疫力下降了。“上工治于未病”，高明的医生善于防病在先。只有激活和传承红色基因，才能增强体内抗体，防止基因变异，减少被感染的几率，才能确保纯洁性，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

强化党的创新力需要传承红色基因。改革创新是红色基因的固有特质。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才建立了新中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现在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破解前进道路上矛盾和困难，更加需要激活和传承红色基因，让敢闯、敢冒、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让奋发有为、只争朝夕的创业精神，让自立、自强、自信的拼搏精神重新激发出来，才能坚决克服惰性、去除暮气，使党员干部激发创造活力，推进改革创新，在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中展现新作为。

参考与建议

拓宽党内监督的技术空间

□ 肖剑忠

党内监督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主要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监督，并展现了新一届党中央以强化党内监督引领全面从严治党和解决党的问题的党建战略路径。党内监督不仅关涉主体和对象，关涉内容，还关涉手段。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制度与技术两种手段并重。

应该承认，党内监督作为政治科学的研究内容之一，其效果不显著的原因往往在于制度，其难题和症结的根本破解之道也往往有赖于制度的探索和完善。正是循着通过制度手段来加强党内监督的思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以及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等制度改革方案，以有效克服和努力解决很长时期以来纪委监督同级党委软弱无力、无所作为的体制难题。更具体说，也正是通过健全巡视制度、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统一派驻监督制度、公务接待制度等原有制度，通过制定或修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等制度规范，以及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违反法定程序干预司法的登记备案制度等新的具体制度，从而有效地加强了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政治、作风、权力、思想、纪律等方面的监督，显著地提高了管党治党的水平。

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类置身信息化社会的当今时代，加强党内监督，在重视制度建设的同时，还需要重视技术手段，应积极应用先进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技术手段对于有效加强党内监督的强大推动作用，我们可从两个例子窥见一斑：一是各地政府办事大厅已经实行十多年的各职能部门网上并联审批。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引入和应用，政府职能部门的审批变得透明和高效，办事拖拉、乱收费、卡拿索要、故意刁难等问题因此得到根本性的遏制。二是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广泛使用的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移动终端。由于领导干部不仅在工作时要与普通党员和群众打交道，且生活在群众之中，一旦有违反党纪国法以及社会公德的言行，往往会被手持手机的党员和群众记录到手机上，无论这些视频、录音资料是交给纪委等有关部门，还是直接晒在网上，其结局往往是涉事党员干部言行曝光、风光不再。近年来，因为这一技术路径而被曝光违纪行为，进而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不在少数。

就未来而言，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在党内监督中的应用其实还有广阔的空间。具体如：

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对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的监督。凭借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领导干部个人财产情况将变得更加透明，更容易为纪委和组织部门所掌握，这显然有利于准确地抽查核实领导干部的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有利于对官员贪腐情况的调查。

智能卡技术对党员履行义务、展示先进性的监督。在国内一些地方，当地党委为每位党员开通了智能卡（往往直接利用市民卡或身份证），从而使得每位党员参加组织生活、党员学习教育活动、党员志愿服务活动以及履行缴纳党费等义务的情况，被技术手段及时准确地记录了下来，进而使得党组织考察党员是否履行了应尽的义务、是否体现了党员的先进性，都有可靠的数据说话和作证。

大数据技术对于全体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和违反社会公德情况的监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普通公民在商业贷款、文明出行、乘坐飞机乃至随地吐痰、在公共场合抽烟等公共秩序和公共卫生领域都会留有诚信记录。将这些数据记录与信访部门的记录以及纪委、组织部门所掌握的数据和信息汇总，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党组织可以更加准确地考察党员干部在德的方面的具体表现情况。

总之，考虑到未来先进技术的层出不穷，考虑到人人都生活在网络时代和智能环境的发展趋势，采取“制度+技术”的战略，坚持制度手段监督和技术手段监督相结合，应是强化党内监督的一个选择。

党风党纪